

# 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 “批判者继承现象” ——从1958年对林庚的批判说起

谢 泳

所谓“批判者继承现象”，是指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一般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在中国已发生过的学术批判运动中（如胡适思想批判、1958年双反运动等），批判学术权威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同一学术领域的学科继承者（如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李泽厚与朱光潜，章培恒与刘大杰，袁行霈与林庚，袁世硕与冯沅君等）；二是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并没有因为批判的原因发生完全决裂（洪子诚回忆，受到批判后的王瑶后来没有揶揄讽刺他的学生）；三是继承者在学术领域的创造性贡献没有超越被批判者。

此类现象在当代中国各学科学术发展中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本文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对林庚文艺思想的批判说起。

1958年中国各高等院校发生的双反运动（反保守、反浪费），是反右运动以后对没有成为右派，但在学术思想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又一次批判运动，这次运动持续时间大约一年时间，运动后期成为“拔白旗”运动。

具体到中国高等院校，一个主要标志是对各学科领域学术权威的批判，参与批判者以学生为主，少量的教师也有参与，批判的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当时北京大学曾出版过一套《北京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后来一些国内出版社曾以此为基础公开出版过相当数量批判文章的论文集。

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批判对象是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朱德熙、朱光潜等，对外校的学者如刘大杰、郑振铎、陆侃如、钟敬文等也有涉及。

双反运动发生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大跃进中的所有特点在学术上均有表现，以厚今薄古和鼓励新生力量打倒学术权威为基本追求目标。当时的学术追求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贯彻了为无产阶级服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贯穿着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这是北大中文系文化革命的标志。中文系科学研究工作将不再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服务，则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958年，林庚还不到五十岁，在当时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恰好属于壮年一代。林庚在1949年前，已是有名的诗人，并在厦门大学执教期间，完成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中国文学史》。1950年到北京大学后，先后完成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诗人李白》以及《盛唐气象》等重要论文。与他上一辈的学者比较起来，在学术界是比较活跃的。

现在我们将要分析的是在当时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并不是所有的教授和学术权威都成为了批判对象，比如吴组缃、季镇淮、川岛等人，在双反运动中也曾写文章批判林庚或者其他教授。那么何以会选择把林庚作为一个批判对象呢？我想与他当时在学术界比较活跃有关。另外林庚在他的文学史中很推崇中国古代“士”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思想实际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肯定，这显然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极大差异。

林庚认为“寒士与权贵之间的矛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里难道寒士不是站在进步一面吗？”林庚在自我批判中还承认，反礼教、反权贵、反庸俗等，这些封建时代中正面的形象，必然会产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一类概念。林庚认为这是他自己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林庚自己和他的批判者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价值，但现在看来，林庚早年推崇“士”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确实是一个富于学术意义的重要命题。后来余英时研究中国文化中“士”的价值时，就曾特别提出：“士阶层中产生了一批以道自负之人，不甘自贬身价去入仕。温和者尚自许为王侯的师友，激烈者则拒斥一切政治权威。”林庚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体现出的这种价值，与当时改造知识分子的时代主流完全相悖，它成为批判对象也是必然的事情。

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运动中，学者成为批判对象，政治因素是关键，但也常有学术环境中人际关系恶化后的矛盾激化，或者二者结合，借政治强力改变学术关系，也是基本模式。但我们从后来对林庚的回忆及评价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史料，所以大体可以认为，林庚成为批

判对象,主要是他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对“士”传统的过分推崇,这一点,从学术角度观察,那些批判他的学生倒是没有走眼。袁行霈认为林庚中国文学史研究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主要原因是“1956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抬头,‘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反动口号一时叫得很响。林先生的著作遇到了适宜的气候,顿时身价百倍”。

1958年的双反运动,在中国各类政治运动中,算是比较温和的,学生对老师的批判,现在看来虽然多数没有道理,但在当时表现出的态度还不算激烈,虽然个别文章对老师的人格和学术有伤害,比如许多学生对王瑶的批判就有涉及人格的地方,但主体还是以批判学术思想为基本目标,所以在批判文章中,通常学生对老师还是以先生相称,虽然在学术上已轻视老师,但在行文中还较为客气。

我倾向于把双反运动中学生对老师的批判,理解成是一种学生青春期反叛行为在学术上的表现。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普遍具有反抗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与学术准备间的关系是气质决定学术,而气质主要受流行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青春气质、道德人格和学术准备这三者之间,主要起作用的可能还是青春气质,所以后来在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学者,较少计较学生当时的行为,可能也是意识到了在流行政治文化中学生青春气质的焕发,所以被批判的学者也较少从道德人格和学术准备上责备学生。

一个简单事实是,在当时批判林庚的学生中,后来普遍在学术上有贡献,比如袁行霈、程毅中、卓如、康式昭等。在这些人后来的学术成就中,他们反而倾向于认同自己早年批判过的对象,这说明在政治运动和学术训练中保持了一些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批判的一个附作用是批判者在熟悉批判对象时,受到了被批判者学术的影响,当流行的政治观念过时后,批判中熟悉的学术专业会保持下来。单从学术训练角度说,批判者的政治立场随着政治运动的过去不再彰显,但在批判中养成学术兴趣并得到学术训练也是事实,不然后来人难以解释为什么当年的批判者较容易回到学术中来,这当中并不排除有投机行为,但当青春气质为学术兴趣代替后,学术常常成为他们基本的追求。

早年批判过自己老师的学生,再回到老师身边时,老师多以原谅待之,这个习惯为中国学术保留了一些命脉。我们不敢说那时的政治运动没有对老师造成伤害,但在批判中熟悉了老师的学术路径和学术风格,是特殊时代学生延续老师学术的变异方式,虽是无意的结果,但对学术人才的训练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

批判林庚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用九天的时间完成一本《林庚文艺思想批判》,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由集体署名的

专书,显然比林庚自己学生的批判更为激烈,但也更空洞无物。这本书系统批判了林庚的古代文学研究,使用的方法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苏式文艺理论,本书认为:“林庚数十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主要的还是在于散播反动思想的毒素。他写过两本贯穿着唯心主义史观的中国文学史,和几篇形式主义的‘研究’文章,教了二十多年书。但所有这些,都起了引诱青年读者脱离现实的作用。他的‘滴水微功’,不能弥补他糟蹋现实主义古典文学的错误。他过去也写过不少的诗,但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娱乐’品!旨在帮闲,实在不值一提。”

林庚在北京大学和学生的关系应该说还比较好,1957年北大学生主办《红楼》杂志创刊时,林庚写了贺诗,可见学生是信任他的。这首名为《红楼》的短诗,虽然是应景之作,但也显示出了林庚追求新诗语言、节奏及意象统一的艺术目标,这首短诗只有四句,每句十字,特别具有形式感: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呵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1956. 12. 13

《红楼》杂志1958年第2期,还发表过林庚在劳动工地写的短诗《墙头诗二首》,就在这样完全没有诗意的生活中,林庚的艺术天才还是得到了展现,从无趣的生活中找出了趣味并显示了诗意,林庚写到:

一  
要摘西瓜  
先得快刀斩乱麻  
拖拉、拖拉  
反被瓜藤绊住  
那就太骄气了  
二  
教室里东风有多少  
大家来找找  
没有东风  
怎能够火烧赤壁

(抄自大字报)

一个有艺术天才的诗人,在他早年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追求,同时他又用自己对艺术的敏感去观察并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这使他一生的学术贡献成为后人宝贵的财富,他的文学史著作近年多次再版,并拥有广泛读者,足以说明他的学术努力不会随时代而褪色。

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再提起当年对林庚的批判,人们愿意忘记过去,忘记那一段不愉快的(下转第80页)

骂黑娃：“穷小子穷命鬼贱毛病倒不少！”这篇小说有着丰富的农业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到几千年来农业文明中人与粮食的关系和感情，积淀很深的传统文化心理，诸如节俭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以至对人性的扭曲。黄掌柜对黑娃曾有一番劝导：“庄稼人过日月就凭俩字，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勤开财源，俭聚少成多积小到大。一般人做到勤很容易，俭字上就分开了彼此。”黄掌柜秉持的是几千年来儒家居家过日子的观念，忠厚待人，勤俭持家。他对黑娃，可谓厚也，他要求黑娃的，只是俭也，似乎没有什么错，但他把他的习惯也许是丑陋习惯推己及人，强人所难，令人无法接受。这篇小说在充分展示主家黄掌柜与长工黑娃的舔碗与反舔碗冲突中，也隐含着对传统文化心理中某些陋习的批判，揭示出传统中国几千年来许多奉为圭臬的东西，其实是丑陋不堪的，甚至是令人恶心的。

关注现实，从现实生活溯其源进而剖析人的传统文化心理，陈忠实的目光在现实与历史中往复逡巡。最近几年，一些曾经在关中生活过的历史人物引起了他的浓厚的兴趣，在这些被他认为是“令我肃然敬仰”的人物身上，往往凝聚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其风骨与精神也往往历久不灭，既传达着历史的回声，也映照出今日的现实。他以短篇的形式进行“三秦人物摹写”，写了作家

柳青；写了他的灞河老乡孙蔚如——这个在中条山打得日本鬼子数年过不了潼关进而护卫了古都西安的民族英雄；近期又写了“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用陈忠实的话说，就是“抓取他们人生里最富个性的一二个细节，写出他们灵魂不朽精神高蹈的一抹气象来”。《李十三推磨》是最新作品，李十三本名李芳桂，是一个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秦腔剧作家，编写了十大本戏剧，生前和死后屡演不衰，有的剧作至今流传，他往往借用剧中人物的姓名、唱词、道白来影射指斥清朝统治者，宣传反清思想。李十三的剧作传入清宫内苑，引起了朝廷的密切注意。嘉庆十五年（1810年）夏末，嘉庆皇帝派专使到渭南提拿李芳桂进京问罪，时年62岁的李芳桂正在家中推磨，闻讯后忧愤交加，口吐鲜血，带病而逃，逃出村子二十里，吐血而死。小说着重写李十三推磨前后的情景，写戏的痴迷，当时都没有吃的贫困处境，在磨道里又气又怕，吐血，出逃，最后绝命村外。李十三是一个身处贫苦而不忘写戏的人物，是一个宁死不屈的人物，作者对其灵魂高蹈的精神是赞颂的，对其悲惨的遭际是惋惜的。陈忠实已经摹写出的三秦人物，都是一些铮铮硬汉，身处逆境困境甚至绝境，但精神绝不屈服，甚至以死抗争，是写历史人物，也是在张扬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邢小利，《小说评论》副主编）

（上接第74页）经历。那些批判者当时显示出的对林庚的轻蔑，那种自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的风气，最终没有撼动林庚文学史研究的地位，他们没有超越林庚，他们还得回到林庚的学术道路上来，但难以望其项背了。

林庚在北京大学受到学生批判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有时候会出现另外的相似现象，当年批判林庚的学生，后来在学术上基本退回到了林庚早年的道路上，批判者成了继承者。袁行霈后来成了林庚的助教，清华出版林庚文集的时候，袁行霈写了总序。

2006年，林庚去世后，袁行霈回忆说：

北大中文系要我代系里拟一副挽联。林先生是一位新诗人，他劝我用写旧诗的精力去写新诗，师母的墓碑上他的题辞便是两句新诗。所以，我拟挽联应当用白话，用新诗体，这虽然不合乎挽联的体例，但一定合乎林先生的心意。挽联是这样的：

金色的网织成太阳，那太阳照亮了人的心智

银色的网织成月亮，那月亮抚慰着人的灵魂

上下联的开头用了林先生自己的诗句，后面表达我们对他的谢意。谨以此联寄托我本人以及北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对林先生的悼念。2006年10月5日午后

林庚可以安息了！

#### 【注释】

么书仪、洪子诚著：《两意集》，282页，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参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1—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1—4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两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编著：《林庚文艺思想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1辑，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林庚：《批判我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见《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2辑，1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袁行霈：《林庚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实质是什么？》，同上书，4页。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编著：《林庚文艺思想批判》，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